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編輯

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





GD/A68/28

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

編輯者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刷者 上海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130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843) [I III 60] 類別 文學—散文

字數 213000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1 11/16

1955年7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955年8月上海第1版——第2次印刷 30101—110120冊

定價 八角二分

前言

『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以後，胡風黑幫的假面已被完全揭穿了，原來這是一夥與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系的反革命分子。

全國各地已經揭發了胡風黑幫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大批材料。我們從這些材料中選擇了一部分，編成這個小冊子，從這個小冊子裏，我們可以具體地看到胡風黑幫的猙獰面目和鬼蜮伎倆，以及他的許多反革命罪行。

這個小冊子所收的只是到七月十日為止初步揭發出來的部分材料。今後當繼續編集出版。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

目次

前言

一貫反革命的胡風.....	何家槐(一)
從胡風對地主家庭的態度看他一貫的反革命立場.....	『湖北日報』記者(二)
胡風在土地改革中的反革命活動.....	林向北(三)
揭露胡風的反革命罪行.....	馮雪峯(五)
我所看見的胡風的嘴臉.....	宋之的(六)
胡風是一個甚麼樣的敵人？.....	鄭律成(四)
毒蛇胡風和他的『蛇窟』.....	馮賓符(四)
阿壠向『文藝月報』的一次反撲.....	王道乾(四)
路翎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反革命活動.....	李家興(五)

剝去蒙面強盜綠原『詩人』的面具·····	石鼎(七)
會卓在武漢市文聯幹了些甚麼·····	宋玉田等(七)
揭露會卓對於武漢市工人文藝活動的罪惡陰謀·····	劉緒貽(七)
揭露胡風在黨內的代理人劉雪葦的罪惡行爲·····	于寄愚等(七)
胡風分子雪葦要作徹底的交代·····	知俠(六)
揭發胡風分子劉雪葦在安徽所進行的反動活動·····	『安徽日報』編輯部(二)
胡風分子彭柏山在上海的一些罪惡活動·····	黎家健(二)
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彭柏山破壞戲曲事業的罪行·····	周璣璋(三)
爲胡風反革命集團忠誠服務的劉雪葦、彭柏山·····	賴少其(三)
胡風集團骨幹分子賈植芳的醜惡面目·····	習平(四)
賈植芳在復旦大學的陰謀活動·····	王永生(五)
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謝韜的罪行·····	雲光(五)
反革命分子牛漢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陰謀活動·····	潔聖(六)
剝掉反革命分子方然的偽裝·····	亦成(七)
給國民黨反動派通風報信的方然·····	趙銘彝(八)

冀訪在浙江文聯創作組的陰謀活動	聞竹雨(一八四)
反革命分子冀訪夢想的是什麼？	朱秋楓等(一九三)
蘆甸的反革命行徑	張學新等(一九六)
魯黎的『詩』是爲反革命服務的工具	沙 鷗(二〇五)
揭露胡風分子呂焚的罪行	邢福崇等(二二三)
胡風分子耿庸的罪行	王文華等(二三七)
胡風分子梅林的醜惡面目	翟永瑚(二三〇)
胡風分子莊湧在我們學校裏的罪惡活動	上海市第二女中語文教研組(二三八)
揭露胡風分子張禹(王思翔)的反革命罪行	朱子程等(二四三)
胡風分子王戎在上影劇本創作所的反革命活動	王世楨(二四七)
揭露胡風和胡風分子歐陽莊的罪行	李士海(二五三)
揭發在廣州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朱谷懷的罪惡活動	虞澤甫等(二五五)
揭露胡風分子華田的反革命罪行	陳運籌(二六三)
揭露杭行在第一勞工醫院的罪行	金 鵬(二六八)
揭露胡風分子杭行的罪行	姚 泓等(二七〇)

我們接觸到的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	『文藝報』編輯部整理(二七四)
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對『文藝月報』的進攻	『文藝月報』編輯部(二八五)
胡風反革命集團如何在武漢建立據點進行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	于黑丁(三九三)
堅決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天津市的罪惡活動	鮑昌(三〇七)
掀掉胡風在天津的地堡	方紀(三三三)
胡風集團的惡行	魏金枝(三三〇)
胡風集團在新文藝出版社的反革命活動	季晉(三五五)
胡風反黨集團在新文藝出版社幹了些什麼	峻明(三五九)
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新文藝出版社的破壞活動	峻青(三五二)

一貫反革命的胡風

何家槐

下決心與革命爲敵

胡風的反革命活動，一般人都以爲是一九三三年參加「左聯」（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領導下的進步作家組織）以後開始的，其實還要早得多。胡風原名張光人，又名谷非，湖北蘄春縣人，出身於反動的地主階級家庭，他的兄弟在解放以前，是當地有名的惡霸地主。胡風在一九二五年前就曾混進共產主義青年團，但被段祺瑞統治下的白色恐怖嚇昏了頭腦，因而一九二五年他堅決要求退出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退出時他對組織威脅說：「好，過了十年再看，看看究竟是誰行！」

後來，他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個時候。

混進了「左聯」進行挑撥破壞

一九三三年他從日本回來，在上海混進了「左聯」。他一方面對那時領導「左聯」的周

揚同志、夏衍同志等人肆意攻擊，到處造謠；一方面又拚命地包圍魯迅先生，欺騙魯迅先生，挑撥魯迅先生和周揚同志、夏衍同志等『左聯』領導人的關係（也經常在魯迅先生面前誹謗馮雪峯同志）。

『左聯』自從成立（一九三〇年）到自動解散（一九三六年）為止，都是處在極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國民黨爲了配合對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圍剿』，在文化上也實行了殘酷無比的『圍剿』政策：逮捕、監禁、屠殺革命作家，搗毀進步影片公司，封閉進步書店，禁售革命文藝書籍，禁止發行革命文藝刊物，此外還出版了『社會新聞』、『社會日報』、『文化列車』等特務報刊，對革命文藝運動進行誣陷、污蔑和攻擊，動員了『第三種人』、『自由人』、『民族主義文學家』、『新月派』、革命叛徒楊邨人之類反動文人一齊圍攻革命文藝……。所以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是在法西斯反動派的『圍剿』和艱苦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是在污蔑和壓迫之中壯大發展起來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頁歷史，就是用革命者的鮮血寫成的。

而胡風却在這個殘酷的革命戰鬥中，幹着不可告人的勾當。

魯迅先生在『左聯』成立大會的講話中，首先就是要求大家『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意實力』。可是胡風，却把主要的矛頭指向『左聯』，指向

『左聯』的領導人。他故意歪曲蘇聯文藝界清算『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俄文簡名譯音，『拉普』於開始時在蘇聯文學的發展上當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後來這個團體的領導機構裏混進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他們散佈着一些反馬克思主義或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時，蘇聯無產階級作家隊伍還很薄弱，因此『拉普』在工作 and 理論上出現了一連串的錯誤；提倡什麼『文學和藝術中的辯證唯物論的方法』；鬧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否定民族文學傳統；反抗聯共（布）中央的領導，因而於一九三二年被解散）的事實來攻擊『左聯』，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否認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作用，污蔑黨和文藝運動的領導；而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却只偶爾裝出一點戰鬥的姿態。魯迅先生在那次講話中，還特別強調『戰綫要擴大』，反對放鬆真正的敵人而在一角裏造成革命文學工作者相互間的鬥爭。可是胡風，却一貫卑劣地運用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的伎倆，極力想造成『左聯』的分裂，造成革命文學運動內部的分裂，極力想縮小革命文藝的戰綫……。

胡風這樣幹，和『第三種人』、『自由人』、『民族主義文學家』、『新月派』以及革命叛徒楊邨人之類，反動文人所幹的正是『異曲同工』，互相呼應的。

最惡毒的，是胡風居然企圖挑撥魯迅先生和『左聯』的關係，也就是和黨的關係。他千方百計阻止魯迅先生參加『文藝家協會』（『左聯』自動解散後，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

新成立的進步作家團體），並造謠說革命文藝界中有人污蔑魯迅先生是托派。一九三六年六月間，托派匪徒曾經忽然寄信和反革命刊物給魯迅先生，目的自然是在破壞我們的黨，破壞中國革命，並妄圖玷污魯迅先生，而就在這個時候，胡風有計劃地造出這樣的謠言，其目的很明顯地也正是在破壞我們的黨，破壞中國革命，妄圖玷污魯迅先生。胡風這樣幹，顯然是和托派的陰謀有關，而胡風以後的一切作爲，也證明了他與托派匪徒的血肉關係。

由此可見，胡風在『左聯』時期就早已經是一個革命文學陣營內的奸細，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派來的暗探；在當時魯迅先生雖然還沒有能够識破他的奸計，而爲他的兩面派手法所蒙蔽，但正如馮雪峯同志所說，這決不是魯迅先生的過錯。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不是任何人所能破壞的，魯迅先生對於革命的忠誠，也不是任何人所能動搖的。托派匪徒企圖破壞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可是魯迅先生公開的回答是：『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爲同志，是自以为爲光榮的。』胡風企圖破壞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自然也不能成功。雖然他的挑撥手段暫時之間的確也發生過一些作用，引起了魯迅先生的一些不愉快，但魯迅先生後來終於對胡風起了懷疑，而並沒有給胡風欺騙到底。

胡風口口聲聲地自稱是魯迅傳統的唯一繼承者，可是他不但在暗中危害魯迅先生，毀壞魯迅先生，而且在公開的文章中，也處心積慮地歪曲魯迅先生，故意曲解魯迅先生革命思想

的發展過程，這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

他是怎樣『投入』神聖的抗日戰爭的

抗日戰爭爆發了。這時候，胡風自己躲在大後方，却冷嘲熱諷地罵提倡上前綫去爲『前綫主義』，繼續宣傳『沒有經過大的生活波濤』，『也能够達到高度的藝術的真實』（以上均見他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寫的『略論文學無門』），陰謀阻止愛國青年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和投身於火熱的革命鬥爭。事實上也的確有些青年受其毒害，逃避戰爭，脫離革命，而想發揮『主觀戰鬥精神』，從事『藝術的追求』，以致可恥地墮落下去，消沉下去。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起到一九三八年年底止，即從抗日戰爭開始到武漢失守爲止，這一時期中，全國文藝工作者都很興奮，紛紛組織演劇隊和抗宣隊到部隊、農村中去進行宣傳動員工作，寫出了很多短篇小說、通訊報告、牆頭詩、街頭詩、報告劇、街頭劇，以及活報等等短小精悍的作品。儘管這些作品存在着不少的缺點，但在抗戰初期却起過很大的作用；像『放下你的鞭子』那樣的街頭劇，確曾感動過很多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可是胡風這位『文藝批評家』呢，却認爲這些作品根本不是藝術，在他的『批評』中，把它們輕輕地一概抹煞了。

在抗戰初期的武漢，胡風和胡風分子曾編印一個叫做『七月』的文藝刊物。在這刊物

上，他發表了很多散佈不健康思想情緒的有毒素的作品，而且積極宣傳他那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文藝創作的指導，否認作家必須具有進步世界觀，說什麼『藝術即政治』，『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可以補足世界觀缺陷和生活經驗不足等等資產階級文藝觀點。實際上是陰謀使進步作家離開馬克思主義和黨的領導。

販賣反動的文藝思想

一九四二年三月，胡風到了桂林。在這裏，他也同以前一樣，不斷地向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投出惡毒的嘲罵，罵他們爲『市僧』，把當時進步文藝界的戰鬥叫做『混亂』，他拒絕和人合作，却獨自搞他的『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藉此招兵買馬。雖然他把有些當時在解放區的作家和詩人的作品也編選出版，但其主要目的却是在於偽裝革命和欺騙讀者，把他們當成資本和幌子，其次也是在於企圖把他的觸角伸展到解放區去。

一九四三年他從桂林到了重慶（這是他第二次到重慶）。在這裏，他更有計劃地反對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反對由黨員作家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他那表面上好像只是宗派主義的小集團，活動得更加肆無忌憚了。那時的情況是，雖然蔣介石所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都已被我們先後擊退，但國民黨反動派在國民黨統治區的

特務統治却並沒有削弱，反而由於軍事政治的嚴重危機而日益加強了。他們越來越兇殘地壓迫民主力量，到處設立集中營，大批屠殺、監禁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封閉、摧殘進步書店，箝制進步文化和言論，我們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尤其不時地遭到迫害。可是以『進步作家』面目出現的胡風，在這個時候，却並不是集中力量反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反對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投降政策，却集中力量配合國民黨反動派反對我們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事業，有計劃地傳播他那反動的文藝理論：這是只要看舒蕪所揭露的材料就可知道的。

在胡風第一次在重慶的時候，就曾經利用過『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來販賣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版的『論民族形式問題』中，他會有意地把『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和民族的文藝傳統割斷，把『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形式看成是完全從資本主義國家移入的東西，把魯迅先生描寫成爲一個民族遺產的否定者；他用了很多篇幅來攻擊民間文藝和古典文藝作品，把它們一概看成封建文藝，就是像『水滸』那樣偉大的作品，他也說成沒有絲毫民主性和革命性；同時，胡風更明目張胆地宣稱『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是屬於世界資產階級文藝的一部分，而不是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這些荒謬透頂的理論，很明顯，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

的理論和毛主席的著作的。

公然向黨的文藝方針、向唯物主義宣戰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一連發表了好幾篇關於整風運動的著作，反對主觀主義傾向、宗派主義傾向、和作爲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可是，自稱革命作家和理論批評家的胡風，却針鋒相對地發表了一連串片面地提倡主觀精神作用的文章！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了。這個偉大文件是一切革命文藝的理論思想上的指導原則，其中所提出的作家立場態度問題、作家思想改造問題、作家學習問題、文藝界的統一戰綫問題，無論在解放區或是國民黨統治區都同樣存在着，都需要認真地加以研究和儘可能地加以解決。可是胡風却對這個偉大的文件肆意詆毀，說這只是『馬列主義A、B、C』（以後他甚至稱之爲『被當作圖騰的小冊子』），不值一看；同時他又通過他和他的黨羽們寫了一系列文章暗中曲曲折折地反對這個文件，在文章中故意誇大勞動人民的落後性和盲目性，說他們的身上充滿了『精神奴役的創傷』；同時却特別頌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強調他們一貫的進步性和他們與人民的天然聯系，這樣就把知識分子必須深入生活、深入羣衆、進行思想改造、根本改變立場的必要性和意義完全抹煞了，這顯

然是故意反對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的方針。

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重慶時期，對於當時的進步文藝是一概蔑視和排斥的。他們用了『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這兩頂帽子，抹煞了一切較有現實意義和戰鬥作用的作品，例如對於郭沫若的『屈原』和茅盾的『腐蚀』等確實曾在皖南事變後起過顯著政治作用的作品，他們都認爲是藝術性很低，根本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而對於他們自己集團中的分子則互相標榜，互相吹噓，歌頌備至，例如對於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胡風就曾說過這樣肉麻的話：『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

一九四五年，在胡風主編的『希望』上發表了舒蕪的『論主觀』和胡風自己的『置身在爲民主的鬥爭裏面』。胡風說『論主觀』是提出了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要讀者『認真閱讀這篇文章』，而且『要無情地參加討論』。事實上舒蕪的這篇文章和胡風自己的『置身在爲民主的鬥爭裏面』都是極端反動的文章。胡風在他的文章裏面極力宣揚他的所謂『自我擴張過程』和『主觀戰鬥精神』，提倡他的所謂『人格力量』和『真誠追求』，而認爲這種作家的『自我擴張』或『主觀戰鬥』才是藝術創造的唯一源泉。這兩篇文章都是對於唯物主義的宣戰，對於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的宣戰。當時，重慶進步文藝界在黨的領導之下，曾由馮乃超同志等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對這兩篇文章